

日本菅义伟政府台海政策及其与台湾地区关系发展走向

严安林

〔内容提要〕日本菅义伟政府上台以来，对中国的政策开始进行调整与变化——根本转变了安倍执政后期所确立的缓和中日关系的政策立场，包括在台海政策上采取了进一步介入台海事务、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大力推进、提升与台湾地区的关系。这一政策转变的外在大背景是美国拜登政府继续秉持“战略竞争”，甚至是“战略对抗”的对华政策立场以及纵容日本对抗中国的“盟友政策”，内在深层动因则在于日本国内政治的进一步右倾化，视中国发展为日本最大的“现实威胁”，在内部治理不佳、菅义伟权威不足情况下，对华遏制政策成为其“甩锅”执政失败、转移视线、提振内阁支持率的选择。未来日本与台湾地区很可能在军事、安全、海洋与高层往来等方面有较大进展，日本政府“一中”政策进一步空心化。

〔关键词〕菅义伟政府 台海政策 日台关系

〔作者介绍〕严安林，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二级研究员，上海市台湾研究会会长。

2020年9月随着安倍卸任、菅义伟就任首相后，日本政府的对台政策开始发生变化，出现了菅义伟“期待与蔡英文通话”“安倍要访台”等各种传闻。2021年初以来，日本政府接连在台湾问题上“出牌”，如与美国拜登峰会后声明公开提出关注台海事务、日本副防相中山泰秀呼吁拜登“坚定支持台湾”“保卫台湾”等等一系列言行，昭示着菅义伟政府对台政策已完全不同于安倍执政后期，日台关系呈现新的发展动向。

一、菅义伟政府台海政策与行为的新动向

（一）菅义伟政府官员公开宣称“高度关注”

台海安全

2021年3月17日，美日“2+2”（外长与防长）会谈的联合声明中，不仅再度确认日美同盟“一如既往是亚太地区和平、安全与繁荣的基石”，日本决定加强包括防御体系建设，为进一步强化同盟关系提高自身防御能力，美国强调将动用包括核武在内的一切力量毫不动摇地参与日本的防御事务，联合文件中还首次提出“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4月16日，日本首相菅义伟访美，并在与拜登会面后发布《美日新时代全球伙伴关系联合声明》。声明表示，日美确认将参与建设“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并基于规则制定

国际秩序”；日美认识到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技术方面对日美同盟和世界的影响，重申对自由合法贸易的支持，双方尊重国际法，认同其中规定的航行、飞越自由以及其他合法利用海洋的行为；提出《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将钓鱼岛纳入美国毫不动摇参与日本防御事务的覆盖范围。两国反对一切试图改变现状、或损害日本对钓鱼岛控制权的“单方面行为”；“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鼓励和平解决两岸问题”。显然，这一声明的目标主要针对中国，干涉中国内政。^{〔1〕} 5月19日，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与澳大利亚国防部长达顿举行电话会谈，就台湾海峡局势交换意见，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台湾存亡”。5月27日，日欧发表联合声明，“强调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敦促和平解决两岸问题”。6月在G7峰会领导人宣言中也是首次提出“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值得关注的是，面对希望避免与中国发生冲突的德国总理默克尔，菅义伟甚至直接做其工作，要求写进上述内容。因此媒体评论道：菅义伟政府在美国构建“对华包围圈”的行动方面可谓是“倾注了力量”。

（二）菅义伟政府官员开始称呼台湾为“国家”

2021年4月27日，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在内阁会议上报告2021年版《外交蓝皮书》时，赋予台湾地区“极为重要的伙伴”的定位。6月10日，菅义伟在日本国会首次以“国家”指称台湾地区。6月29日，日本防卫副大臣中山泰秀强调中国与俄罗斯的“合作带来日益上升的威胁”，称“要保护台湾这个民主国家”，具体而言就是“日本在外

交层面积极联手美国利用台湾问题，深度参与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与四方安全对话（Quad），以期强化日本在亚太地区的国家综合实力。”^{〔2〕} 日本政府新版《防卫白皮书》甚至将东亚地图中的大陆与台湾分别标注为不同的颜色。这显然是日本政府在涉台问题上再一次突破与升级。

（三）菅义伟政府出台政策进一步挑动中日关系及台海局势紧张

日本政府及其官员2021年初以来不断在台湾问题上做出公开、强势的政策表态，如7月13日，日本政府公布的年度《防卫白皮书》中，循往年惯例以国别叙述日本周边军事状况时，今年首度将台湾地区从叙述中国军事的章节中抽出，独立成一个个别的议题并置于新增加的“中美关系”之后。白皮书特别强调中国军队近来在台海周边愈发活跃，称“台湾局势稳定”日本的“安全保障当然非常重要”。同时，防卫大臣岸信夫也呼吁国际社会进一步关注所谓“台湾的存亡”，为了“防止台湾的未来被武力决定，对华施加广泛的国际压力非常重要”，只有国际社会要求台湾保持和平，台海的和平才有保障。7月29日，首届所谓“美日台国会议员战略对话”视讯会议登场，日方安排的神秘嘉宾、前首相安倍晋三致词时强调“台湾非常重要”，支持“台湾”参加包括世界卫生大会（WHA）、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CPTPP）等国际组织。岸信夫发表书面致辞指出，区域安全保障环境“趋于严峻”，日本对“台湾”的关心增高，就如先前美日领袖会谈共同声明所写的，美日两国强调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并希望两岸问题和平解决。^{〔3〕}

〔1〕 新华社东京2021年3月17日电。

〔2〕 《新闻剪辑：日本多次称“台湾为国家”》，台湾：《远望》杂志，2021年5—7月号，第4—5页。

〔3〕 《台怂愿美日：若台海有事，就认了我们吧》，香港：中评网，<http://www.crntt.com/doc/1061/4/6/7/106146788.html>，最后检索时间：2021年7月30日。

二、菅义伟政府上台以来 日本台海政策调整的基本特征

(一) 开始不断地冲击“七二体制”

自1972年日本与中国邦交正常化、与台湾当局“断交”后，日本政府只与台湾地区保持经济与民间往来，形成日本政府处理台海事务的“七二体制”后，大体保持了稳定发展的态势。但自冷战结束后，日本政府开始不断渐进地调整对台政策，出现了表面上坚守“七二体制”，实质上松动甚至改变“七二体制”的迹象与行为，并不断地在局部层面上实质性地冲击“七二体制”，提升日台实质关系。如安倍政府期间，将对台窗口“公益财团法人交流协会”更名为“公益财团法人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台湾方面也将“亚东关系协会”更名为“台湾日本关系协会”，通过交流机构向“准国家机构”的“渐进式升级”，实质性提升双方之间官方关系。特别是在官方文件中把台湾地区视之为“国家”，甚至就称呼为“国家”。双方官员公开交往层级不断提升，民进党当局“驻日代表”谢长廷4月6日对媒体表示，5日他首度应日本执政党自民党邀请，到自民党总部针对“台湾政策”议题交换意见。谢长廷表示，“台湾”要增强防务能力，但战争并非仅靠军力，士气也很重要。譬如，民主国家的支持也很重要，目前除了美国以外，无任何一国可单独对抗中国大陆，因此需要与日本的共同合作。

(二) 日本与美西方其它国家联合干预台湾问题

日本与美西方在涉台问题上联手倾向更加明显。除了前述的美日“2+2”联合声明涉及台海局势外，4月16日美日领导人峰会联合声明中再次提到台海。6月日本与澳大利亚2+2、日本与欧盟领导人峰会、G7外长会、G7峰会等又都提到“强调台湾海峡和平稳定重要性，鼓励和平解决两

岸问题”。特别是G7公报，首次将“台湾海峡”纳入，通过“联合阵线”方式对付中国。既显示出日本与其它美西方国家联合干预台海局势的趋势日益明显，当然也反映出日美在台湾问题上共同需求。

(三) 日本干预台海事务的多系统性与多面向性

日本干预台海事务往往与涉海及“民主”、“人权”等价值观议题纠缠在一起。如美日峰会，不仅提及台海，且强化双方在东海与南海问题上合作。日本与其它美西方“台湾牌”相同，都是以“价值观”作为纽带，通过“民主”“人权”等议题，拉拢台湾当局充当“遏华”急先锋。美国国安会中国事务高级主任罗森博格认为美中战略竞争性质就是“制度之争”，强调与中国打交道，内部需要跨党派团结，外部需要联合盟友伙伴，要在美国国内既鼓励辩论，也跨越党派界限，以证明“民主能起作用”。

三、菅义伟政府对台政策新变化的 深层背景与原因

前述日本高官所多次发表挑战中国政府“红线”的涉台言论，在台湾问题上不断地说三道四，包括菅义伟政府上台以来的一系列政策行为，都是赤裸裸地干涉中国内政。这些政策变化一方面表明日本政府明显在加大利用台湾问题对中国的牵制，另一方面也表明日本对华政策中的台海战略已经改变，并且是日本已经从美国“台湾牌”的“附随”角色，变成主动运用台湾问题遏制中国的“战略推手”，日本开始走到“抗中保台”的第一线。其中深层背景当然在美国拜登政府对中国的对抗性战略与政策及其盟友政策的新变化，这是最大的动因。此外日本国内政治生态的变化与菅义伟政府错误的对华认知及基于地缘政治考量、积极承担“遏华”角色也是重要原因。同时，

蔡英文当局对日游说工作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一) 美国强化对抗性的对华战略与中美战略关系新变化

1. 新冠疫情后全球局势新变化。新冠疫情对于全球经济与社会各层面的冲击，现在看来应该是远远大于2008年全球经济与金融危机的影响，甚至不小于两次世界大战，堪称百年未有之大冲击与大变局，而且其影响还远未结束，还在持续进行中。疫情给人类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四方面的影响：一是经济全球化面临严重的冲击与挑战。一定时期内在一定程度上是进一步逆转经济全球化，但不会是“压倒经济全球化骆驼”的最后的一根稻草，长远看还是“改善经济全球化”，未来的经济全球化，一定是有别于以前的经济全球化；二是冷战后形成的美国单极霸权体系开始松动。这不仅是特朗普4年任期内不断的“退群”所导致，而且是美国国力的力不从心所决定，这也是拜登政府开始强调“美国回来了”的同时，不断采取“借重盟国”政策的无奈选择；三是“西方中心论”开始动摇。尽管因为疫情让“西降东升”的发展态势受到冲击，但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势头难以逆转，长期而言依然是“西降东升”，非西方世界崛起，东西方共同发展。特别是曾经被誉为最优秀的西方“自由民主”体制陷入“治理失灵”困境，当然“西方中心论”走向历史的终结还需要较长时间；四是中国的崛起成为百年变局中最大的变量。东亚地区力量格局不再是完全由美国主导，中国的份量在不断上升，作为美国盟国的日本的担忧不断加深，便自诩要为维护美国所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发挥积极而重要作用。

2. 拜登政府的亚洲战略与对华政策的新变化。拜登政府亚太政策和对华政策与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相同之处主要有二：一是以美国利益为优先，服从与服务于美国国家利益，“保障国内的

自由，并将再次成为世界的灯塔”；二是将中国视作最主要的竞争与对抗性对手。两者本质相同，但做法有异，即通过技术竞争、军事竞争、经济竞争、意识形态竞争和外交竞争，建立“地缘战略联盟”“经济联盟”“技术联盟”与“治理联盟”。新变化主要在：一是强调同盟关系与伙伴关系。基于不同的同盟组合，如所谓“民主10国”，即G7+澳大利亚、韩国与印度；如“印太机制”的美、日、印、澳，认为美国保护和促进其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利益的唯一方法就是成为拥有共同目标和价值观的国家联盟的一部分，加强与盟友和伙伴国的联系来确保美国全球主导地位，将是美国拜登政府重要的国家战略。拜登在2021年2月4日美国国务院演讲中表示，美国将修复盟友关系，再次与世界接触，不是为了应对昨天的挑战，而是为了应对今天和明天的挑战。美国领导层必须应对威权主义不断推进的新时刻，包括中国同美国竞争表现出来的日益增长的“野心”，以及俄罗斯破坏美国民主的决心。美国的同盟关系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通过外交发挥领导作用，意味着将再次与盟友和主要伙伴并肩站在一起；二是强调规则的重要性。旨在构建“自由与开放的亚洲秩序”与排除中国参与制订的经济规则；三是强调民主、人权等价值，推动“价值观外交”，发展“价值同盟”；四是重视经济因素的作用。特别是美国私人企业在亚洲政策实施中的作用。

3. 中美“全面战略竞争”态势的清晰化。拜登政府上台后，基本继承了特朗普政府视中国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的定位与对华的对抗性战略，中美“全面战略竞争”态势明显。2021年1月31日，布林肯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专访时说，美中关系有对立竞争一面，也有合作一面。但无论处理美中关系哪一方面，都必须能够以优势而非劣势的地位同中国打交道。这种优势来自于强大

的联盟，来自于美国参与世界事务和参加国际组织，来自于美国在遭受中国“挑战”时捍卫美国的价值观，来自于美国能确保军队威慑住中国侵略。正是因为这样的认知，将中国视为“最大竞争对手”，拜登需要继续在“印太”地区构建、维持一个向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等地区主要国家寻求支持的“反华联盟”，特别是打“日本牌”，进而“台湾牌”在美国对华战略中的作用不降反升，不仅引发中国大陆武力遏制“台独”的力度不断加大，而且中美战略关系的对抗性一面加剧，日本对台政策也开始从以往的“战略模糊”转为“战略清晰”，诱发日本改变以模糊的“周边有事”来定义美日同盟出兵的立场，直接点出“周边”便是指“台湾”与“台湾海峡”。日本内阁官员涉台言论越来越直接，发言层级越来越高。日本防卫副大臣中山泰秀在接受哈德逊研究所专访时，直言称“台湾是国家”，台日是“亲兄弟”；岸信夫接受彭博专访时表示“台湾”的和平与稳定，与日本的安全息息相关。麻生太郎在一场演讲中宣称，“中国如果侵犯台湾”的话，日本将会行使集体自卫权，与美国共同来协防“台湾”。这充分表明：不仅是美国拉拢日本共同阻止中国实现完全统一的态势明显上升，日本政府也开始在考虑动用武力反对中国完全统一的立场。

（二）日本对华政策的新认知与新变化

日本政府台海政策变化的深层因素有跟随美国打“台湾牌”的因素，也更加重视所谓“台湾民主”，因为日台双方“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加之各自社会民众对于对方的好感度不低的社会基础，更在于日本政界与战略界将中国大陆发展视为潜在与现实“威胁”。正是出于维护自身国家战略需要的考量，日本不只是单纯的“跟随美国遏

华”，而是转变为“拉美遏华”、联合美国介入台海事务。

1. 疫情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菅义伟政府对中
国政策及其台海政策。因为疫情爆发，习近平主席的访日推迟与东京奥运会延后，安倍政府后期事实上就开始对中国大陆和缓的态度有所调整。菅义伟虽然不像安倍那样与台湾地区，特别是与民进党有很强的人际关系，但他对台湾当局较为友好的立场也是显而易见的，据悉其对台湾当局的想法深受其政治导师梶山静六的影响。梶山在1997年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中提出台湾海峡应该被包括在“日本周边地区”^{〔1〕}。

2. 中国《海警法》的实施被日本政府错误地理解为“激进的政治军事行动”。如日本学者坂元茂树认为，《海警法》的管辖海域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海洋法规存在冲突，特别是在毗连区和专属经济区划定“海上临时警戒区”有违《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的“适当顾及他国权利义务与公海自由的要求”，也缺乏有效监督。日本担忧中国加强在东海的海警活动，或使在钓鱼岛周围巡航的日本船只成为中国海警打击目标。尤其在日政界与战略界看来，中日间对抗与冲突已经“结构化”，除了历史问题贯穿在中日关系各个层面外，包括中日之间存在战略对抗、领土争议、外交摩擦与意识形态等问题。日方认为，中国政府把日本视作“美日军事同盟与武装干涉”的威胁，中国政府领导人时常强调东海、台海与南海的领土属于中国“核心利益”，这无一不跟日本有关。中国大陆强化海空军能力建设，是旨在突破美日所建构的第一岛链防线。特别是根据日本防卫省统计，中国飞机与军舰进入日本海空域的规模越来越大、次数越来越高，连续性突破历史纪

〔1〕《梶山重申，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审查包含台湾》，日本：《日本时报》，1997年8月19日。

录，因而日本对于“中国威胁”的感受也是越来越深刻。进而日方甚至认为《海警法》是赋予中国政府对日动武的法源，需要对中国示强。

3. 美国拜登政府的强化盟友政策让日本看到了运用中美之间结构性对抗、以实现压制中国发展的机遇。

在涉台问题上，日本菅义伟政府主动作为的成分更大、更多，并非都是在美国的授意下为之，甚至是日本希望“拉美国下水”。正是如此的盘算，菅义伟政府官员不断肯定与赞扬蔡英文当局的防疫政策，2020年5月后还多次呼呼与表示“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并开始在国际政治中与中国政府保持距离，与台湾当局不断亲近。特别是日本把台湾问题与日本的安全联系起来，在美国的怂恿下，为干涉台海问题进行军事准备。据日媒报道，日美正策划除了在冲绳部署的“爱国者”导弹和海上宙斯盾舰发射的拦截导弹之外，还要在第一岛链部署精准打击导弹系统。

(三) 蔡英文连任后强化对日政策与工作

蔡英文当局认为，未来4年民进党施政成功与否的关键取决于台湾内部的社会改革能否成功与对外关系能否顺利开展，对外关系顺利与否取决于中美战略对冲如何发展，取决于美国政府实施“印太战略”中对“台湾”在其中角色的定位程度。因此，蔡英文在2020年5月连任后对外关系与工作重点是提升对美与对日关系，既以此强化应对中国大陆持续“高压政策”的能力，也为台湾内部的社会改革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针对菅义伟政府强化与美西方联手突出关注台海事务、强势介入台海事务的政策行为，蔡英文当局一方面是公开表示“肯定”与“欢迎”，如2021年8月10日，蔡英文以视讯方式接受日本《文艺春秋》月刊专访时，就表示对于美日两国展现出“重视”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态度，“要表达感谢”。另一方面蔡英文当局在文宣上则是低调应对

“美日联合声明”，而在行动上则是积极配合，在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采取“美、日+台湾”的方式，推进与提升双方甚至三方之间的实质关系。

四、日本菅义伟政府台海政策与日台关系走向

(一) 菅义伟政府可能进一步调整台海政策以发展日台关系

1. 菅义伟政府或将进一步提升与蔡英文当局的所谓“官方联系”。虽然在政策表面上，日本政府尚不会公开承认“台湾是个国家”，承认日台“外交”关系及“官方”关系，但在实质的官方交往上则是放开限制，采取“只做不说”的交往行为。在较为敏感的军事合作领域采取“重实质”、“不重形式”的方式，加强实际操作层面人员往来；经济上，推进日台经济一体化，“脱钩”与中国大陆经济联系。

2. 菅义伟政府或将联合美国等采取实际而具体的行动，全面支持蔡英文当局拓展“国际活动空间”。如通过三方合作助力蔡英文当局参与世界卫生大会等；通过增加三方对话频率，强化相互间政策沟通与协调；通过各种非政府组织，助力蔡英文提高在国际社会的曝光度。

3. 菅义伟政府或将台湾地区纳入美日主导的“西太体系”。政治上，支持民进党当局“联美、抗中、保台”的战略，甚至改造国民党的“友中路线”，使整个台湾社会成为“拒统”的堡垒；经济上将台湾地区纳入美西方“自由民主经济体系”，强化与大陆经济的“脱钩”行为，增强“美日+台”的生产链、供应链、价值链一体化；“安全”上是赋予台湾当局在“印太战略”中一定的角色；海洋问题是推动东海、台海与南海的“三海联动”。特别值得警惕的是，菅义伟政府可能采取一系列步骤为今后进一步干预台海局势做全面的准备，包括军事上“美日+台”合作对抗

中国大陆。3月，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与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在东京会谈时，岸信夫表示今后有必要探讨自卫队能为前往“支援台湾”的美军提供何种协助。日本政府相关人士称：如果台湾海峡或朝鲜半岛爆发冲突，自卫队能基于安保法为美军做些什么？目前已进入有必要开展现实性探讨的阶段。

4. 菅义伟政府或将区别处理日本与台湾地区关系与中日关系。据悉，安倍政府期间，日方就答应蔡英文当局在大方向上发展中日关系同时，不会对日本与台湾地区的关系产生不利，中日关系和日本与台湾地区关系是两条平行线，互不交叉，日方不会因为发展与台湾地区的关系而影响与中国大陆的关系；同样，也不希望因为提升中日关系而“牺牲”日本与台湾地区的关系。麻生副首相甚至告诉台方：“请台湾的朋友，一切放心”。

(二) 未来日台关系发展存在一定局限性

1. 经济全球化基本格局将制约美日步调一致地“脱钩”中国与全面对抗中国，日美之间事实上也存在分歧与矛盾。二战结束后美国GDP曾占世界50%以上，美国可以通过经济补偿方式纠结盟国与当时的苏联进行全面性的对抗。但在当前经济全球化潮流中，不仅美国GDP占比已经大幅下降，目前只有24%上下，且中美、中日在经贸领域彼此仍然是高度依存。2020年美日仍是中国大陆第三、第四大贸易伙伴，且贸易额还在持续大幅增长。这样的经济全球化结构将有力制约美国推动构建的“国际反华同盟”的形成。况且，日本与美国之间对于如何干预台海局势与发展跟中国的关系保持平衡，也存在不小的分歧。美国期待日本在对抗中国的问题上能与其协调一致，但美日在对于“中国威胁”的认知与处理方式还是存在一定落差。日本既希望与美国强化“安保合作”，但又不愿像拜登政府对华竞争表现得那么

咄咄逼人。或许在台湾问题上日本的表现是充当了“急先锋”，但美国亚太政策事务总协调人坎贝尔有关美国“不支持台独”的公开声明，又似乎说明美国并不让日本在台海问题上牵着美国的鼻子走。

2. 日本发展与台湾地区的关系事实上是受到中日关系的制约。尽管日本政府一直利用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中政治共识的“模糊性”，在不断地发展与台湾地区的“非官方关系”，但具体将发展到何种程度？日本利用“经济文化领域”范畴的模糊性推进与台湾当局的实质关系，空间到底有多大？日本与台湾地区关系发展程度，无论如何都是受到中日关系的制约，双方关系发展程度取决于中日关系发展程度。菅义伟曾是日本任职最长内阁官房长官，非常清楚中日关系在日本对外战略中的排位要远远高于日本与台湾地区关系。对日本而言，中国大陆的大国地位、丰富的经济资源和庞大的市场是远在台湾地区之上的。中日双边贸易额维持在每年3000亿美元以上的规模，2020年达到3175亿美元，中国大陆连续12年是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而日本与台湾地区年贸易总额只有690亿美元，不到700亿美元。日本无法为了与台湾地区关系的利益而与中国大陆直接对抗、甚至损害其自身国家利益，菅义伟政府的台海政策应是在寻求与中国大陆关系的“正式性”和与台湾地区关系的“非正式性”之间的动态平衡。事实上，维持日本既有“七二体制”的政策框架完全符合日本国家利益，尤其是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国家利益，中国政府坚定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坚强决心与反应，将决定日本与台湾地区关系难以走远！

3. 日本国内对于干预台海局势与发展对华关系之间存在不小的分歧。菅义伟政府的外交与经济幕僚对于中日关系对日本影响的看法不同，日本商界主流对于与中国的敌对是非常顾忌的。对

菅内阁来说，不仅无法忽视一个现实：中国大陆市场对日本经济的重要性。在中国崛起背景下，中国大陆市场的重要性只会越来越不可被忽视，日本与美国的同盟思维显然与其自身的经济利益是越来越不相符。因此，菅义伟政府应该仍然希望中日关系，无论是政治关系还是经济关系，都保留一定的发展空间。总之，日本需要与美国的同盟，日本也需要与中国开展经济合作。

4. 台湾内部政治及其分歧将牵制日台关系的发展程度。与日本有关的政治议程事实上已经成为台湾地区政治发展中的争议性问题，无论是与日本相关的历史与海洋领土问题，还是“核食”纷争，都反映了民进党与国民党之间不同立场。

2018年“反核食公投”以779万票通过、2年内不得再行提出，不仅让日本政府相当失望，时任外相河野甚至表示这对台湾地区申请加入CPTTP产生负面影响，而且因为是否进口美国“莱猪”的纷争，让蔡英文当局再度开放“核食”也更加困难，尽管日本政府曾经以支持台湾地区参与双边或区域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作为诱饵让蔡英文当局妥协。日方对于日台关系中的障碍，如“核食输台”、东海渔业事务沟通、冲之鸟礁定位等问题上进展的踌躇也比较不满，这些必然阻碍日台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或“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推进及其它关系的上升。

（责任编辑：肖杨）

Yoshihide Suga Government's Taiwan Strait Policy and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Japan-Taiwan Relations

Yan Anlin

Abstract: Since Yoshihide Suga government came to power, Japan's China policy has changed and adjusted, including further involving itself in Taiwan affairs, interfering in China's internal affairs and vigorously promoting and improving relations with Taiwan. It shifted fundamentally the moderate policy of Sino-Japanese relations which had been established at the end of Abe's administration. The external context of this shift is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upholding the policy of "strategic competition", or even "strategic confrontation" towards China and conniving at Japan's confrontation with China, while the internal motivation lies in the furthering of the rightist tendency of Japanese domestic politics. Japan regards China's development as its biggest "real threat".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of poor internal governance and insufficient authority of Suga, the policy of containing China became his choice to shift the blame of administrative failure, divert attention and boost the approval rating of the cabinet. In the future, Japan and Taiwan are likely to make noticeable moves in military, security, maritime affairs and high-level exchanges, and the "one China" policy will be further hollowed out.

Keywords: Yoshihide Suga government, Taiwan Strait policy, Japan-Taiwan relations

Author: Yan Anlin is Vice president of Shanghai Institut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Secondary research fellow, and President of Shanghai Institute for Taiwan Studies.